

赵海虹科幻小说中女性身体修辞研究

——以作品“默”短篇系列为例

郭祎* · 罗敏球**

目 录

1. 引言
2. 女性身体修辞的定义
3. 女性身体修辞的生成机制
 - 1) 符号化身体
 - 2) 技术化身体
 - 3) 政治化身体
4. 对女性身体修辞的展望
5. 结论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赵海虹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女性主义科幻理论、身体修辞理论与技术身体研究，考察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体的表达方式与叙事功能。文章将女性身体定义为一种修辞媒介，并提出“符号化—技术化—政治化”的三阶段分析框架。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女性身体如何从情感的表征逐渐转向成为技术机制，并进一步渗入政治制度与权力层面，成为意义产生与社会象征的核心。本文在方法上提出了“身体描写—意义转译—文化编码—修辞效果”的分析路径，以提升文本分析的可操作性。研究目的在于从身体修辞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女性科幻中的身体书写，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野与方法路径。

*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一般大学院 韩中文化学科 博士修了 (第一作者)

**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教授 (通讯作者)

关键词：赵海虹；中国科幻；女性身体；身体修辞；赛博格；女性科幻作家

1. 引言

科幻小说是在遵循科学法则或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虚构世界、事物、事件等探讨未来社会、人类、科技伦理等问题的一种文学。苏恩文(Darko Suvin)¹⁾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主要依赖“认知性陌生化 (Cognitive Estrangement) ²⁾”为标志的特殊文学类型，并指出科幻小说是“可能性的文学”，通过一种对现有的变异设置，发明一个比现实世界不同但是又是逻辑上正确的世界。

近三十年来，中国科幻文学在题材拓展与叙事深度上均发生显著变化，女性科幻写作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独特力量。伴随科幻叙事重心从“科学启蒙”转向“人文反思”，女性作家在性别、身体与技术的交汇处展开了更具复杂性的叙事。以张静、钱莉芳、赵海虹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通过身体与技术的书写，使中国科幻从理性单一的叙事走向多维的文化探讨。程婧波主编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³⁾ (1990-2020) 即呈现了这一转变趋势。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科幻元素在“女频小说”中逐渐流行，女性作家借助这一平台，将悬疑、恐怖与后人类主题融入文本，展现了她们对技术现代性的反思与想象。

目前国内学界对女性科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形象塑造、主题与叙事策略。王思媛探讨了女性科幻作家在性别观念上的演变，指出其通过女性形象重写挑

1) 盖伊·哈雷著，王佳音译：《科幻编年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

2) “陌生化”(Estrangement)：源自布莱希特的“陌生化(ostraneie)”理论，是指通过奇特设定使读者超越日常生活，重构现实世界。“认知性”(Cognitive)：不同于奇幻的“魔法”设定，科幻陌生须以逻辑、科学、理性认知为立足点。在科学理性逻辑下建构陌生世界，在“陌生化”中实现“再认知”现实世界。

3) 程婧波(编)，《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年版。

战了传统性别二元论⁴⁾。潘越认为科幻为女性作家提供了展示经验与思考的新空间，拓宽了文学中的表达维度⁵⁾。刘洋则借助情感计算方法⁶⁾，对女性科幻中的性别与情感表达进行了量化研究⁷⁾。潘澍从科技伦理视角考察了科幻文学在推动科技与社会创新中的作用⁸⁾。在韩国学界，女性科幻研究亦日益活跃。진아구与김지혜对中韩女性科幻中的“后人类”形象进行比较，认为其构成了异质存在下的伦理探索⁹⁾。김윤정关注东亚女性科幻中身体政治性的跨国共鸣¹⁰⁾。权惠珍通过夏笳作品分析了技术文明下“爱”这一伦理命题的再构¹¹⁾。金瑞恩则以赵海虹为中心，探讨当代中国女性科幻的性别意识¹²⁾。虽然上述研究从多维视角拓宽了女性科幻的讨论，但大多仍将“身体”视为再现对象，着重回答“身体表现了什么”，而对“身体如何在叙事中生成意义”的探讨相对不足。

赵海虹¹³⁾是中国当代女性科幻的代表作家之一，具有研究的典型性和独特性。作为多次获得“银河奖”¹⁴⁾的作家，她在宏观科技想象之外，更关注技术逻

4) 王思媛, <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1999-2021)>, 贵州财经大学, 2023.

5) 潘越, <新世纪女性作家的科幻小说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江南大学, 2023.

6) 情感计算即通过各类计算设备与算法的结合来自动识别、理解和计算与人类情感相关的特征。单纯基于文本的情感计算, 在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这些平台产生的大量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 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方便快捷地掌握大众对某个事件或产品的舆论趋势或情感变化, 从而获得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

7) 刘洋, <女性具有更细腻的情感叙事吗? —基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情感计算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2025年第6期, pp.89-100.

8) 潘澍, <科幻文学的科技伦理审视>, 博士学位论文, 东北大学, 2021.

9) 진아구, 김지혜, <한·중 SF에 나타난 포스트휴머니즘 비교 연구 - 김초엽과 하오징광(郝景芳)을 중심으로>, 《국제한인문학연구》, 제38호, 2024, pp.351-375.

10) 김윤정, <동아시아 여성 SF 문학에 나타난 '몸'의 정치성 연구 - 2000년대 한·중·일 소설을 중심으로 ->, 《이화어문논집》, 제64집, 2024, pp.87-114.

11) 权惠珍, <시간과 존재의 경계를 넘어 - 샤자夏笳의 서사 속 '사랑'의 변주 양상 고찰>, 《中国语文学志》, 第90辑, 2025, pp.213-235.

12) 金瑞恩, <당대 중국 여성 SF 소설에 나타난 젠더의식 - 자오하이홍(赵海虹)의 단편소설을 중심으로>, 《中国语文学志》, 第81辑, 2022, pp.221-244.

13) 赵海虹出生于1977年，作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叙事创新，在科幻界占据了显著地位。她毕业于浙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后获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同时活跃于科幻创作、翻译和教学领域。赵海虹的创作生涯始于1990年代中期，她被誉为“中国科幻界的公主”。

辑对个体生命经验,尤其是女性身体经验的影响。与部分以情感或伦理为主题的女性科幻不同,赵海虹的作品呈现出显著的“身体中心性”——身体在她的文本中不仅是感知与经验的场域,更是技术、权力与主体交汇的修辞核心。她的“默”¹⁵⁾系列横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作为持续创作的长线系列,展示出女性身体在技术语境中不断被形塑、异化与重构的过程。这些作品在叙事结构与修辞策略上具有系统性,为研究中国女性科幻的身体书写提供了理想的文本样本。因此,本文在文本选取上从“默”系列11篇作品中,依据各修辞阶段的历时分布,选取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性文本加以重点分析。运用文本细读与修辞分析的结合路径,探讨女性身体在其作品中如何作为意义生成机制运作。从“身体修辞”的角度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其创作特征的理解,也为中国女性科幻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2. 女性身体修辞的定义

1) 女性身体修辞

“身体修辞”在不同学科语境中具有多维含义。从生理层面看,身体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身体逐渐被理解为承载经

14) “银河奖”(原称中国科幻“银河奖”)是中国针对幻想类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科幻小说,后增加其他相关类别)进行评选的奖项。始于1985年,从1992年起每年评奖,代表着中国大陆科幻创作的最高水准。

15) 赵海虹以陈平为主人公的系列故事其最长久的系列,至今发表过11篇(也叫“默”系列,“默”周刊是陈平工作的报社名称)。其中包括《归航》(1997)、《桦树的眼睛》(1997)、《时间的彼方》(1998)、《情腺》(1998)、《潘多拉的盒子》(1998)、《伊俄卡斯达》(1999)、《异手》(2000)、《永不岛》(2001)、《不枯竭的泉》(2001)、《破碎的脸》(2004)和《1923年科幻故事》(2007),赵海虹指出此系列仍有新篇目在创作中,陈平是投射赵海虹个人理想的角色,所以这个系列的创作一直还在进行中,因此具有跨时代的研究性。

验、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复合结构¹⁶⁾。自笛卡尔提出身心二元论以来，西方思想不断思考身体与意识、历史的关系。现象学代表人物梅洛-庞蒂进一步提出“身心一体”，将身体确立为人类感知与认知世界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福柯将身体纳入权力分析框架，指出身体不仅是个体经验的载体，也是规训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场域。此一转向使身体由“被描写的对象”转化为“被塑造与被编码的文化空间”。女性身体在文学中的再现方式历来受社会意识形态与技术条件的共同影响。传统文学多将女性身体塑造成情感容器¹⁷⁾、道德象征或生育工具，其修辞功能从属于父权体制与家国叙事。这种符号化塑造，正是女性主体性在父权叙事中被削弱的典型表现。

与此同时，修辞学的研究也从单一的“言语说服术”扩展为广义的“意义生成机制”。“身体修辞”概念正产生于此语境之中，其核心观点是身体不仅是被表达的对象，更是参与意义生产与说服过程的媒介。换言之，身体本身是一种可被“阅读”的文本，其形态、感知与变化过程皆具修辞功能¹⁸⁾。

在女性主义理论语境中，身体修辞更显政治性。女性身体长期处于父权话语的规训之下，被物化为欲望的对象或再生产的工具。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演进，身体逐渐成为抵抗父权与重构主体性的核心。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提出“性别操演性”理论¹⁹⁾，强调性别并非生物学本质，而是在社会行为的重复中生成的实践性构造，这一观点启发了对身体的动态理解——身体并非自然既定，而是持续“被实践”的过程。在科幻叙事中，这一问题因技术介入而进一步复杂化。随着科技不断改写人类身体的边界，身体被重新定义为可被改造与编码的系统。唐娜·哈拉维

16) 杨扬，《电影中的身体语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 指能够承载、吸收、投射或转化他者情绪的对象、机制或媒介。女性常被塑造为具有“情绪承载功能”的角色，例如：情绪调节者，男性创伤的吸纳者，家庭情绪的稳定装置。因此“情感容器”成为批判父权结构中女性被剥夺主体性的重要概念。

18) 杨阳，〈国产小姐电影的身体修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20，pp.2。

19) 巴特勒提出性别 (Gender) 不是一种内在的生物本质，也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身份，而是一系列行为的持续重复。她提出“做”性别 (Doing Gender)：我们不是“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在通过每天的穿着、言谈、举止不断地“做”男人或女人。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Donna Haraway) 提出的“赛博格”概念，揭示了人体与技术的混合性：身体成为人类、有机体与信息系统交汇的节点。因此，身体既是文化意义的承载体，也是技术与权力作用的接口。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和二十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²⁰⁾被视为女性主义科幻研究的重要文献，它以赛博格视角突破了性别与物种的界限，为理解当代女性身体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尽管相关研究已从性别、技术与文化等角度对女性科幻开展多层讨论，但主流关注仍集中于“身体表现了什么”，即将身体视为再现的客体。相比之下，对身体如何在叙事过程中过渡为修辞机制、并参与意义生产的系统性研究仍属不足。

赵海虹的小说正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典型个案。其作品中的女性身体随时代、科技与思想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形。“默”系列作品跨越了中国科技迅猛发展的关键十余年，从《归航》等早期文本到《1923年科幻故事》等晚期创作，既展现了作者个人创作风格的演变，也反映了中国女性科幻从文学隐喻到赛博叙事的转向。这一系列作品为考察女性身体修辞在技术语境下的阶段性转化提供了理想的历时性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研究重心由“身体再现”转向“身体修辞机制”，探讨身体如何在叙事层面被构造、转译并生成意义。

2) 女性身体修辞的分析方法

为系统阐释女性身体修辞的生成逻辑，本文提出“符号化身体”“技术化身体”与“政治化身体”三种机制。这三者并非并列的静态分类，而是彼此交叉、动态流动的意义维度，共同构成女性身体在科幻叙事中的修辞体系。

首先是女性符号化的身体(Symbolic Body)。“符号化身体”指身体通过叙事语言与文化语码被转化为意义系统的过程。在这一机制中，身体不再只是生理实体，而是承载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依据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身体的描写可视为“能

20)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是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的学术著作，收录了其1978-1989年的文章，其中核心章节《赛博格宣言》最初于1985年发表。唐娜·哈拉维著，陈静、吴义诚译，《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指”(signifier),其“所指”(signified)则指向特定的文化意涵,如他者性、主体危机或情感结构。在父权文化语境中,女性身体往往被纳入既定的象征体系,承担母性、欲望与牺牲等意义投射。朱莉娅·克里斯蒂瓦(2001)关于“母体与符号”的论述中指出,女性身体常被放在男性逻各斯体系²¹⁾之外,成为象征他者的媒介²²⁾。伊利格瑞(2005)的研究指出,女性身体在父权制话语中往往被置于“他者”位置,其意义由外部结构所规定²³⁾。因此,身体的修辞功能在于将具体经验转译为可读的文化符号,实现从感性经验到抽象意义的转化。女性身体因此成为情感、道德、欲望等社会意义的集中显现之处,也成为支撑叙事情感的重要符号载体。

其次是女性技术化的身体(Technologized Body),“技术化身体”关注技术如何介入身体构成与主体经验。在科幻语境中,女性身体常通过机械化、数据化或虚拟化等方式被重构,从而突破传统的自然与人工、物质与意识的界限。唐娜·哈拉维(2012)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赛博格”概念,认为赛博格是超越人类与机器、自然与技术二元对立的新型主体。她指出,赛博格的身体不再是封闭的自然有机体,而是开放的混合体,是人类、有机生命与技术系统的融合产物。在这一视角下,身体成为技术作用的场域,它既被技术定义,也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意义结构。同时,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进一步强调,在信息社会中,身体日益被转化为可计算、可存储与可传输的“信息身体”,被重写为编码和数据构成的存在。在此机制之中,女性身体经常被置于技术实验与思想实验的交界位置。技术化过程一方面解构了身体的自然属性,使其成为身份与认知的可变场域;另一方面也引导出主体认同、性别边界与身体自主权的复杂问题。技术化身体的修辞核心在于探讨:当技术深度介入生命结构时,女性如何通过身体经验重新形成主体性,以及身体在信息化世界中如何作为叙事的生成机制而存在。

21) 指的是一种以男性经验为核心,强调理性、逻辑、秩序、同一性和话语权力的思维与文化架构。这个体系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其中左侧(男性/逻各斯)总是被视为优越的,右侧(女性/物质)则是被动的。

22)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著,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3) 露西·伊利格瑞著,李金梅译,《此性非一》,桂冠出版社,2005年版。

最后是女性政治化的身体 (Political Body)，“政治化身体”强调身体作为权力运作场域与社会结构投射体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不仅属于个体经验维度，同时被纳入制度、治理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体系。福柯 (2003) 理论中指出，现代权力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与管理，将其纳入社会治理的技术体系，使身体既成为被动的政治对象，又是生产力运作的基础。进一步地，吉奥乔·阿甘本 (2016) 提出“赤裸生命”概念进一步指出现代政治通过对生命本身的管理来实现权力的强化²⁴⁾；尼古拉斯·罗斯 (2014) 进一步论证了当代权力如何延伸至分子与基因层面，通过生物技术与数据治理塑造生命与主体性²⁵⁾。在科幻叙事中，这种政治性往往被极度放大。女性身体不仅受制于性别规范，还成为技术、权力与制度多重作用的试验场。例如，身体被微观化、标准化或社会化的描写，映射出现代社会中权力对生命控制的日常化形态。政治化身体的修辞功能正是在于揭示权力如何通过身体实现编码、规训与再生产，从而暴露现代社会在“技术-权力-身体”循环中的隐性逻辑。

上述西方理论框架在进入中国女性科幻文本时，需经过本土语境的批判性调适。赵海虹的创作横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时期恰好对应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科技现代化急速推进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女性身体所承受的规训压力并非单纯来自西方意义上的‘父权制’，而是同时叠加了社会主义集体伦理对个体身体的历史性塑造、独生子女政策所形成的生育政治，以及技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意志对身体的重新定义。因此，本文在运用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说时，将其视为分析工具，并在具体文本分析中持续关注这些西方概念与中国语境之间的差异。

24) 吉奥乔·阿甘本著，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25) 尼古拉斯·罗斯著，尹晶译，《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 女性身体修辞的生成机制

基于前文提出的赵海虹小说中女性身体修辞的“三阶段模式”——“符号化—技术化—政治化”，本章拟分为三部分，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不同阶段中身体修辞的生成与转化过程。

1) 符号化身体

“符号化身体”是赵海虹创作早期阶段的重要特征，其代表性作品包括《归航》和《桦树的眼睛》。在这一阶段，女性身体主要作为情感、伦理与象征意义的承载物出现，是作者女性意识初步介入科幻叙事的标志。

《归航》²⁶⁾是赵海虹“身体的符号化”修辞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归航》以飞船“诺曼号”在宇宙航行中遭遇外星病毒为背景，描写宇航员亚瑟与其妹妹安妮相继感染病毒的经历。为了阻止病毒回到地球，安妮主动要求兄长将飞船驶入黑洞，以自身生命换取地球的安全。

他和我们的样子很相像，也有四肢，也有五官和毛发，他的皮肤是红色的，眼睛特别狭长，嘴唇特别丰润，透着一种蓝宝石般的光泽。……虽然经过了仔细的消毒，我们仍然担心他身上会有其它病毒。只有安妮一点也不担心，她在无菌舱里细心照料外星人，那情景就像小姑娘照顾她的洋娃娃似的，让人看了又好笑又温馨。²⁷⁾

这一描写以“照料”与“洋娃娃”的意象构建出一种亲密、温柔且非防御性的身体接触关系。在严谨的宇宙航行场景中，安妮的行为违背了科学理性的自我保护逻辑，体现了女性角色特有的感性与关怀特质。其身体被设定为“照料的媒介”，成为情感与伦理意义的物质化载体。“细心照料”的动作转化为柔性修辞符

26)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4期，1997年版，p.4-p.10。

27)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04期，1997年版，p.6。

号，而“洋娃娃”意象则提示了女性身体的客体化与被凝视属性。女性身体在此成为情感与生命伦理的中介空间——既是安慰与温情的象征，又是被牺牲的对象。这一设定揭示出早期女性角色仍被锁定在“情感容器”的叙事结构中，身体因此成为性别化符号的焦点。安妮的‘主动性’是在父权结构允许的范围内完成的——她的身体被允许牺牲，恰恰因为她的牺牲服务于更大的集体（地球）利益。这与巴尔所指出的‘女性先受害’叙事模式在结构上相同，女性以身体为代价换取道德崇高性。

安妮病中的脸颊带着一种憔悴的青白色，干裂的嘴唇微微开合。我这才发现：仅仅三天，安妮的眼眶已深深地陷了下去，像两个黑色的洞。……“哥哥，请把我们送到黑洞天体去吧，你们健康的人不必陪我们牺牲，把诺曼号开回地球去吧。”安妮近乎哀求的话，极度地震荡着我那已被乱麻缠绕的心！……我想到了安妮，她曾经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年轻姑娘，现在却苍白憔悴、虚弱不堪；而这只是开始，有更痛苦的事在等待着她。

这一段的细节描写通过“塌陷”“憔悴”等词汇强化了身体的衰败意象，构建出一种“健康-枯槁”的二元对照。身体在这里成为叙事的关键媒介——其衰败对应着个体与文明的危机，也提示着“女性牺牲”与“拯救整体”的伦理关联。正如唐娜·哈拉维所指出的，传统科幻中女性身体往往被设定为“可穿透的边界”（permeable body），象征脆弱、情感化与可感染性²⁸）。马琳·巴尔（Marleen S. Barr）也指出，这种叙事常通过“女性先受害”的模式强化性别脆弱性神话。因此，在这一阶段，赵海虹虽呈现了女性情感的力量，却仍延续了传统科幻中

28) 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1985）虽挑战二元对立，但承认传统科幻中女性身体常被构建为“permeable”（易渗透的边界模糊），易受技术/外来物侵袭。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原文发表于1985年。

马琳·S·巴尔的《Alien to Femininity: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Feminist Theory》（1987）讨论科幻中女性作为“先受害者”的原型，身体成为外星/病毒侵袭的媒介，延续了文化对女性脆弱性的刻板印象。

Marleen S. Barr, *Alien to Femininity: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Feminist The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7)。

的性别结构。女性身体被赋予象征意义，而非技术或认知能动性，是被叙事规训的“符号性身体”。《归航》并非一个纯粹的‘符号化’文本，安妮的感染本身是技术介入的结果（外星病毒作为技术性他者），而她‘不被允许回到地球’的隐性逻辑，已经触及身体被国家与集体权力所支配的政治维度。

《桦树的眼睛》²⁹⁾讲述植物学者许瑟瑟的死亡事件。其好友陈平回乡调查时，通过瑟瑟研发的“植物情感测定仪”发现白桦树林在她死亡当晚发出异常信号，进而揭露出瑟瑟的未婚夫白朴为真凶。白桦林最终以“愤怒”的方式反噬白朴，完成象征性复仇。

此刻漫步林间，每一棵桦树上似乎都有无数只眼睛在闪动，每一只都像是瑟瑟的眼睛，温柔美丽的眼睛。阳光透过枝叶照进林间，在碎石小径上撒下点点跳跃的金斑。本来是晴朗无风的天气，桦树的枝叶却在微微颤动，发出“瑟瑟”的声音，空气中仿佛飘荡着一种令人怀念的气息。瑟瑟已匆匆离去，离开了她热爱的生活，离开了她热爱的世界。但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却感到她还活着，与那桦树林一同在我身边低唱？我的心中涌起难言的情感，有怀念，有悲哀，还有追忆往事时的怅惘。³⁰⁾

在这段描写中，身体意象通过“桦树的眼睛”这一隐喻得以扩散，眼睛的感知功能被赋予树木，使“自然”具有人格化特征。通过“树斑=眼睛”“桦树=瑟瑟”的转喻与隐喻，赵海虹实现了从个体身体到自然景观的审美转化，体现了中国传统“物我合一”的思维方式。女性身体不再局限于生理形态，而成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情感媒介。这种自然化的修辞策略，使死亡不再意味着终结，而成为情感与记忆的延续。瑟瑟的身体被转译为不断流动的“自然生命”，其存在在树木的“闪动”与“颤抖”中得以延续，形成一种后人类式的身体观。

此时整个桦树林已如地狱，四面充斥着可怕的声音，摇摇摆摆的大树，纷纷折断坠落的枝叶，鹅毛般的雪片，仿佛都是有生命的，全都一起在我们

29)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11期，1997年版，p.16-p.27。

30)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11期，1997年版，p.19。

身边怒吼!不,不仅仅是这样,它们也要战斗!.....

.....我紧闭着嘴,屏住鼻息,甚至闭上眼睛。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强忍多久,再这样下去我没被毒死就先要窒息。无论是怎么死,我都已看见死亡的大门向我敞开.....

忽然间,我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夹着一声惨叫,抱着我的手臂松开了。我睁开眼,只见白朴倒在地上,一棵粗大的白桦树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不仅如此,还有三四棵桦树剧烈地摇摆着,接二连三地倒在他的身上,发出一声声的轰然巨响。这是桦树的愤怒。³¹⁾

结尾处的拟人化描写赋予自然以能动性,树木成为情感与正义的执行者。自然与身体、情感与复仇在此融为一体,象征女性在死亡之后通过“自然之身”获得持久的行动力。女性身体的功能在此从“情感容器”转向“道德媒介”,实现了从“被动承载”到“主动表达”的象征性跨越。

从《归航》到《桦树的眼睛》,赵海虹通过女性身体的象征性转化,完成了由“生理身体”向“修辞身体”的过渡。前者通过牺牲与感染的意象强化情感结构,后者借助自然化修辞实现身体的再生与升华。两篇作品共同构成了“符号化身体”阶段的主要文本范式:身体被赋予多重象征意义,成为连接生命、情感与伦理的修辞中介。这种符号化倾向不仅揭示出女性身体在父权叙事中的复杂定位,也为其后“技术化身体”与“政治化身体”的展开奠定了逻辑基础。

2) 技术化身体

在“技术化身体”阶段,赵海虹不再仅依托象征意象或自然隐喻来呈现女性身体,而是将身体直接置入技术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可被延展、转换乃至融合的存在。在这一阶段,身体由生理与情感层面转向技术维度,成为连接自然、人类与机器的中介载体。

《时间的彼方》³²⁾讲述青年科学家林凯风在研究“四维空间双向视频交流仪”

31)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11期,1997年版,p.26。

32)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8期,1998年版,p.10-p.27。

时，偶然在西汉丹阳王墓中看到26年前的一桩杀人事件。随影像展开的真相探索，使他被卷入考古、新闻与权力的多重体系之中。尽管作品中女性角色不多，吴欢作为核心女性形象，却在身体修辞上具有代表性。

人类总是习惯于区别现在和未来，总认为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到哪里，整个宇宙的时间也就走到哪里。其实未来与历史一样必定存在，但让19岁的我就知道45岁的自己已然在未来的世界里生活着、呼吸着，这是一件多么难以想像却又是多么合情合理的事！对于一个还对未来充满着美好憧憬的少女来说，突然要面对一个青春已逝的中年时的自己，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³³⁾

文本通过“四维影像”的设定，使人物能够跨维度观看自己的未来。吴欢被技术“再现”为可见的形象，但她的身体同时失去了触感与物质性。她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四维交流仪”的成像结构——只能被“看见”，却无法被“触碰”。这种“可见而不可触”的存在状态，使女性身体脱离了自然物理界限，而成为一种技术影像体。

在此意义上，身体不再是经验性的，而呈现出“被编码”的特征，它既是技术装置输出的结果，又是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符号。身体的显现依附于科学仪器，从而丧失生理的确定性与主体的完整性。这种“被技术化的可见性”揭示了身体如何被重写为影像、信息与控制的对象。同时，吴欢在时空跨越的交流中，具备了超越肉身限制的交流能力。这种跨时存在的“沟通权”看似赋予女性新的叙事能动性，但该能动性并非来源于个体本身的能力，而是被技术机制所规训的结果。由此，女性身体的修辞功能从“被象征”转向“被处理”，从情感与伦理意义的承载物转化为技术化的影像主体。

《异手》³⁴⁾更直接展示了身体被技术侵入、分裂与重构的过程。小说以女火山学家马兰和记者陈平在白头山考察期间感染“异手症”为线索。所谓“异手症”，源自一种名为“声波M”的特殊声波，它破坏人脑胼胝体功能，使左右脑通讯中断，导致患者的左侧身体被“异意识”控制，出现暴力与自我攻击行为。陈平在寻找失踪专家的过程

33)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8期，1998年版，p.22。

34)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6期，2000年版，p.10-p.22。

中，与同伴共同经历疾病发作与技术阴谋的真相。

虽然坚持上白头山时，我就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途中我可能会发病，可能会让章见到那种丑态——可那是对人类的“章”而言。

作为高智慧的外星生命，看着低等的人类和自我争斗不体会怎么想呢？

我想保留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

左半边的身体像癫痫病发作似的抖动起来。左手像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开始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就连“话语权”也开始不断地转换。

“还给我！还给我！”左手一把勒住我的脖颈，狠命地掐。我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用右手抓住左手手背向外扯。

这疯狂的状态没能持续多久，我就在脑部的剧痛中失去了知觉。³⁵⁾

文本中“左手像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这一比喻，突破了器官的功能定位，赋予身体局部以主体地位，使其从器官转化为“异主体”。此时身体内部出现裂变与冲突：控制与被控制、理性与暴力的界限被打破。女性身体不再被动承受外在力量，而成为多重意识与技术力量交织的场域。这种异化并非象征意义上的精神分裂，而是技术介入所导致的真实层面的“身体分裂”。“声波M”作为入侵媒介，打乱了身体内部的原有权力结构——个体不再完全主宰自己的身体，而身体也不再完全服从意识。“左手掐住脖颈”的场景，不仅制造出强烈的冲突感，更揭示了技术如何重新界定“我”与“身体”的边界。当部分身体被外界力量重新编程后，自我控制的秩序随之崩解，意识与肉体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撕开。技术不仅改变了身体的形态和功能，更深入地重构了人的意识、身份与自我认知。身体成为权力与科技共同作用的节点，被重新塑造成复杂的控制系统。女性身体因此获得某种“局部能动性”，它可以突破人类的躯体极限，却也在失控中暴露出主体的危机，当身体具备超越理性可控时，“自我”反而被身体所吞噬，主体边界也随之模糊。

与“符号化身体”阶段女性作为“情感容器”的被动角色不同，在“技术化身体”阶段，女性身体获得了一种混合而复杂的技术能动性。它不再是被凝视或被

35)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6期，2000年版，p.16。

牺牲的符号，而成为技术实验的现场与思想辩证的载体。身体在此被信息化、可视化、分裂化，体现出科技与性别互相构建的过程。赵海虹在这一阶段通过“影像化”“信息化”等叙事策略，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的存在方式。身体不再属于自然生命的范畴，而被改写为技术语境下的文化与哲学问题。

3) 政治化身体

进入“政治化身体”阶段，赵海虹不再将女性身体局限于象征或技术层面，而是将其置入伦理、制度与历史语境中，使身体成为能够被定义、被治理、同时也能够对社会与现实产生回应的存在。

《伊俄卡斯达》³⁶⁾以陈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讲述女科学家梅拉妮·欧辛的生命与伦理悲剧。她因涉嫌谋杀丈夫弗尔而被拘押，审查过程中向陈平自述自己与“沉睡五万年的远古男性”弗尔的关系：她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唤醒并以自身作为代孕母体孕育了他，随后又与其结合生子，形成一种“逆向伊俄卡斯达式”的乱伦结构。

“好吧……好吧……也许我今天做错了事，但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找人倾诉这一切，那可怕的罪孽快把我折磨死了，它一直压在我心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想办法忏悔的话，我会发疯的。弗尔和亚特虽然理解我，但是他们无法真正体会我的心情……他们甚至根本不认为我犯了罪。可是我有罪，苍天在上，我罪该万死，我……就是伊俄卡斯达。”³⁷⁾

梅拉妮向陈平坦白时直言：“我就是伊俄卡斯达”，并详细叙述自己十六年前克隆史前人、被迫怀孕生下“儿子”弗尔、后又嫁给他并生下亚特的过程。她的身体经历本身已经超出日常伦理，作为研究者，她却成为代孕母体，与被唤醒的远古男性建立关系。这一系列行为并没有被直接描述为“异常”，关键在于，这种“有罪

36)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3期，1999年版，p.16-p.28。

37) 《科幻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第3期，1999年版，p.20。

感”并非来自外部审判，而是逐渐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此处的女性身体被转译为道德问题，是需要被承认和被忏悔的。这些其实互相冲突的身份在她的身体上发生重叠，当今社会的的伦理体系无法容纳这种重叠时，身体本身就成为“被问题化的空间”。

梅拉妮默默点头，脸上浮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容，凄凉、美丽。嗣后我才知道那笑容的意义：她终于可以结束这罪恶的生命。……

梅拉妮踏碎了自己的金丝眼镜，用碎镜片割破了她自己的血管。使用这种工具自杀是很艰难的，自杀者必须下很大的决心，忍受痛楚的折磨，才能用那样的碎玻璃镜片切开自己的动脉。她是一心求死啊，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梅拉妮最后以碎镜片自尽，“踏碎金丝眼镜，用镜片割破血管”，这一场景常被阅读为赎罪与自我解脱。在《伊俄卡斯达》中，女性的子宫和感官不仅是生理器官，更是伦理制度的表现。怀孕的身体经验成为她罪感与宿命意识的触发点，母性与爱情之间的冲突，使她的身体成为类似索福克勒斯神话“伊俄卡斯达”的现代寓意。梅拉妮的身体秘密具有高度生命政治学意义，她因杀夫嫌疑被拘押，身体行为成为国家司法解释的对象³⁸⁾。若暴露其“以自身孕育丈夫”的事实，她将“不被社会容纳”，并牵连儿子亚特。她作为母亲、妻子、科研者身份交叠，使她同时受父权伦理、科学伦理与社会道德三重纪律化³⁹⁾。

若以阿甘本Homo Sacer (神圣人)⁴⁰⁾的概念重读梅拉妮的处境，其结构更加清晰。她的身体处于法律秩序的'例外状态'之中。作为代孕母体，她的身体被纳入科学实验的逻辑；作为妻子，她的身体被纳入婚姻制度的伦理约束；作

38)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2003年版。

39) 米歇尔·福柯著，汪民安编，《自我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0) 吉奥乔·阿甘本著，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利与赤裸生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Homo Sacer (神圣人) 在古罗马法上指的是“不许用于献祭，且杀死他的人不会因杀人而受到谴责”(neque fas est eura immolari, sed qui occidit, paricidi non damnatur) 的人，其意思就是那种被排除在世俗政治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以及人法与神法两界之外的人，因此，homo sacer 的含义应该是“被双重排斥的人”。

为嫌疑人，她的身体又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三重权力话语在她的身体上叠合，使其既受制于所有规范体系，又无法被任何单一体系所完整容纳——这正是‘神圣人’的核心处境，即被权力所捕获，却又被排斥于正常秩序之外。梅拉妮最终以碎镜自尽，其死亡既是个人的‘解脱’，也是对这种无处安身的政治处境的根本性拒绝。

《伊俄卡斯达》是三种修辞机制叠合最为密集的文本，政治化维度占据主导，而符号化与技术化机制则从两个方向深度渗入叙事结构。就符号化维度而言，“伊俄卡斯达”这一神话命名本身即是一个强烈的符号化操作——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伊俄卡斯达因无意识的乱伦而自尽，梅拉妮的命运在此被纳入这一跨文化的悲剧符号系统，使其个体经历获得了神话原型的意义重量。就技术化维度而言，克隆技术是整个伦理悲剧的起点与前提——正是技术赋予了梅拉妮“唤醒远古生命”的能力，也正是技术的介入将她的身体纳入一个超越常规伦理框架的处境之中。技术在此并非解放性力量，而是将身体置于新型伦理困境的触发机制：它扩展了身体的可能性边界，却同时制造了现有制度无法容纳的主体位置。

《1923年科幻故事》故事的核心线索围绕科学家贾苏发明的“水梦机”展开。该装置通过液体记忆与蒸汽振动记录人类的过往经历与内心片段，是一种将“心灵碎片”物质化的技术媒介。女革命者泡泡在逃亡途中短暂躲入贾苏的实验室，意外触发了机器，机器便以影像与回声的方式重现了她的童年记忆、革命动机及个人情感中的挣扎与痛楚。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她慌了。很久没有真正害怕过什么了，但这一次她真的怕了。她扑倒在地上，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上百只瓶子里说：我是革命者，我不是女人。我是革命者，我不是女人。而那一百次的回声之间有微弱的时间差，仿佛整个空间被精密地丈量分割，而每一分寸的地方都有这样一句话在等待着她，与她的大脑一次又一次地遭遇。我是革命者，我不是女人。我是革命者，我不是女人。“停止！停止！”她歇斯底里地叫出声来。

这一场景通过技术装置的“回声”再现，将个体的自我陈述分割并无限复制，使泡泡不得不在“革命者”与“女人”两种身份之间不断对峙。她既想摆脱性别身份的束缚，又无法彻底脱离身体经验的记忆。水梦机在此并非纯粹的叙事道具，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力装置”：它不仅记录记忆，更以技术手段将个体的意识与情感“固定化”“档案化”。女性身体因此被转化为可被存储、调用和再现的历史数据。作品的关键并不在于“选择革命”这一行为本身，而在于“必须做出选择”的存在性困境。身体被置于身份冲突的十字路口——既是“革命者”，又是“女人”，必须在二者间确立优先性。通过对影像的反复播放，水梦机强化了这一二元对立，使个体在技术的注视中不断被重新定义。泡泡的结局（被捕与处决）并未直接呈现，但通过“龙华的桃花回不了家”等片段被反复暗示，身体在消失之后，以另一种形式被保留下来。泡泡的革命者身体成为被机器储存的政治记忆。技术不再是中性工具，而是将符号化情感与技术化杂合推向政治记忆的最终形式，女性身体成为被规训、被保存的历史证词。《1923年科幻故事》以政治化机制为核心，但符号化与技术化维度同样深度参与了文本的修辞建构。符号化赋予泡泡的身体以历史厚度，技术化将其转化为可被管理的信息存在，政治化则揭示了这种管理背后的权力逻辑，三种机制在《1923年科幻故事》中达到了赵海虹创作中最为完整的修辞整合。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本研究得以从赵海虹作品中呈现女性身体修辞的变化路径。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关键不在于“女性身体获得了什么能力”，而在于“身体如何被纳入何种结构之中”。女性身体不再只是情感容器，也不完全成为技术主体，而是升华为分解精神意义上的高度。这一变化标志着赵海虹的小说中女性身体从“技术性身体”向“政治性身体”的深化，也可以通过女性身体的描述与分析成为理解其作品的关键。

4. 对女性身体修辞研究的展望

在中国科幻逐渐进入全球文化体系的背景下，女性创作不再只是类型文学上的一个分支，而正成为推动叙事结构与意识形态革新的重要动力。相较于早期以“科学想象”为核心的科幻传统，女性科幻更关注身体经验、情感结构与技术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赵海虹为代表的作家，其作品中女性身体修辞的演变，并非个体创作的偶然路径，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女性科幻内部的思想与美学演化逻辑。

首先，从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女性科幻对身体的书写将进一步深化技术介入的层次。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身体的概念与边界：“身体”不再是稳定的生理实体，而成为可被设计、调节与替换的多维存在。在此语境下，女性身体将从“被技术改变”转向“被技术管理”。它不仅是技术作用的对象，更可能成为算法、数据与制度体系中的“管理单元”。这种变化意味着未来女性科幻的关注重点将由“技术如何影响身体”转向“身体如何被纳入技术与权力的管理机制”。其次，未来的女性科幻也可能突破单一的性别对抗叙事，转向更加复杂的身分结构与主体建构。随着后人类语境的扩展，性别与身体被重新定义为可重组、可变异的多维状态。女性角色在未来文本中，既可能作为技术系统的参与者与创造者，也可能是其监督者、批评者或抵抗者。身体不再只是反抗父权的象征工具，而成为身份转换、思维重构与伦理探讨之间的媒介。这样的叙事转向，预示了女性科幻从“性别政治”走向“人类—技术共演”的文化思考。第三，伴随科技媒介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女性科幻的表达方式也正在经历跨媒介化的扩展。影视改编、游戏叙事以及虚拟现实等互动媒介，使女性身体的叙事不再局限于文字表达，而通过影像化、数字化与沉浸式体验被重新塑造。这种跨媒介实践使女性身体的修辞不再停留于文学话语，而在视觉文化与技术美学领域中获得新的表现空间，扩大了女性科幻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渗透力。

然而，中国女性科幻的理论研究目前仍较多依赖西方女性主义、科技文化

研究与后人类主义框架。虽然这些理论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但在解释中国经验时仍存在局限。中国社会结构、科技发展路径以及家庭伦理与治理机制与西方语境差异显著。因此，有必要在借鉴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批评体系，使研究能够回应中国语境中的独特问题。例如，如何在社会转型与技术现代化的背景下讨论身体的权力关系与性别经验，仍是尚待深入挖掘的领域。

在此意义上，赵海虹作品中呈现的“符号化—技术化—政治化”三阶段修辞模式，为理解中国女性科幻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该模型揭示了女性身体如何在不同语境中实现意义转换，为中国女性科幻研究提供了从文本分析走向文化机制研究的路径。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探索：女性身体在不同科技、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如何被重新定义，以及这种再定义如何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性别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语境中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潜力。近年来，韩国女性科幻（如金草叶等作家）同样聚焦于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但在叙事策略上更强调个体情感与社会结构的微观联系；而中国女性科幻则倾向于在宏观制度与历史框架下思考身体的社会定位。从中韩比较的视角出发，探讨女性身体在不同技术体系下的演化与话语策略，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东亚女性主义科幻的理解，也能为跨文化女性主义理论提供新的经验素材。

总之，中国女性科幻的未来发展将呈现出多重趋势，技术介入的深化、主体性结构的复杂化、跨媒介叙事的扩展化以及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在这些趋势之中，女性身体仍将是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核心。然而，其意义将超越单一的象征或再现，成为连接科技、制度与文化的关键入口。女性科幻通过对身体的持续书写，不仅回应技术现代性的挑战，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

5. 结论

本研究以赵海虹“默”系列为核心文本，围绕女性身体在科幻叙事中的呈现方式，提出并论证了“符号化—技术化—政治化”的修辞模型。通过文本细读与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女性身体在赵海虹的作品中经历了从情感象征到技术介面，再到制度化权力场域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作者创作逻辑与美学意识的演进，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科技发展与性别文化变动中的深层结构。

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将“身体修辞”从一般的象征性解读转化为“意义生成机制”的分析维度，提出“符号化—技术化—政治化”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女性身体在叙事功能上的演变逻辑，为理解中国女性科幻的身体书写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第二，本文提出“身体描写—意义转译—文化编码—修辞效果”四环节的分析路径，以增强文学文本分析的层次性和可操作性。该方法从文本内部细节出发，关注身体如何成为意义生产的媒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研究工具。第三，通过对赵海虹作品的系统性考察，本文指出中国女性科幻的身体叙事在发展逻辑上有别于西方传统。其关注的不仅是性别意识的觉醒，更是技术化时代中个体与制度、身体与权力的互动关系。这一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科幻的文化特征，并为东亚语境下女性科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参照框架。

与此同时，本文也存在若干限制。首先，研究范围集中于赵海虹短篇作品，对其他女性科幻作家的创作尚未充分覆盖。其次，本文侧重文本内部分析，对读者接受机制、媒介传播与科幻产业等外部因素的探讨仍显不足。再者，科技政策、社会结构与身体政治之间的关联性尚需进一步拓展与验证。这些问题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总体而言，赵海虹的创作展示了女性身体在中国科幻中的多重可能性，它既是情感的承载体，也是技术的界面，更是制度与权力作用的焦点。女性身体修辞从“符号化”向“技术化”再到“政治化”的演进，不仅丰富了她作品的叙事层次，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在科技现代性中的位置变迁。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

架，希望为今后东亚科幻研究中有关性别、技术与政治的交叉议题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著作：

Barr, M. S. (Ed.). *Future Females: A Critical Anthology* [M].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1.

Balsamo, A. *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 Reading Cyborg Women*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ooker, M.K. Thomas, AM, *The Science Fiction Handbook*, Wiley-Blackwell, 2009.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고장원, 《중국과 일본에서 SF 소설은 어떻게 진화했는가?》, 부크크, 2017.

盖伊·哈雷著, 王佳音译; 《科幻编年史》,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年版。

程婧波(编), 《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21年版。

达科·苏恩文著, 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 《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

吉奥乔·阿甘本著, 吴冠军译, 《神圣人:至高权利与赤裸生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版。

江玉琴,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访谈录》,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版。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第4期, 1997年版。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第11期, 1997年版。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第8期, 1998年版。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第3期, 1999年版。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第7期, 1999年版。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第8期, 2000年版。

露西·伊利格瑞著, 李金梅译, 《此性非一》, 桂冠出版社, 2005年版。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米歇尔·福柯著, 汪民安编:《自我技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 尼古拉斯·罗斯著, 尹晶译, 《生命本身的政治: 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 唐娜·哈拉维著, 陈静、吴义诚译,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 杨扬, 《电影中的身体语言》,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 中国科普研究所著, 《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4》,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版。
- 朱迪斯·巴特勒著, 宋素凤译,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版。
-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著, 张新木译, 《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

学位论文:

- 姜雨佳, 《在未来与现实之间—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研究》, 硕士论文, 吉林大学, 2023。
- 潘澍, 《科幻文学的科技伦理审视》, 博士学位论文, 东北大学, 2021。
- 潘越, 《新世纪女性作家的科幻小说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江南大学, 2023。
- 王思媛, 《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研究(1999-2021)》, 硕士学位论文, 贵州财经大学, 2023。
- 杨阳, 《国产小妞电影的身体修辞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期刊论文:

- 金瑞恩, <당대 중국 여성 SF 소설에 나타난 젠더의식 — 자오하이홍(赵海虹)의 단편소설을 중심으로>, 《中国语文学志》, 第81辑, 2022, pp.221-244.
- 权惠珍, <시간과 존재의 경계를 넘어 — 샤자夏笳의 서사 속 '사랑'의 변주 양상 고찰>, 《中国语文学志》, 第90辑, 2025, pp.213-235.
- 김윤정, <동아시아 여성 SF 문학에 나타난 '몸'의 정치성 연구 -2000년대 한.중.일 소설을 중심으로->, 《이화어문논집》, 제64집, 2024, pp.87-114.
- 김형욱, <초등학교 과학영재 학생을 대상으로 한 데이터 시각화 학습 프로그램

- 개발 및 효과 - Tableau 프로그램 활용을 중심으로->, 《초등과학교육》, 제43권, 제1호, 2024, pp.18-34.
- 박남용, <중국 SF소설의 과학기술과 문학적 상상 연구>, 《중국인문과학》, 제80집, 제1호, 2022, pp.189-208.
- 진아구, 김지혜, <한·중 SF에 나타난 포스트휴머니즘 비교 연구 - 김초엽과 하오징광(郝景芳)을 중심으로>, 《국제한인문학연구》, 제38호, 2024, pp.351-375.
- 方舟, <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研究特征论>, 《汉江论坛》, 第02期, 2022, pp.104-109.
- 韩松, <中国科幻的新征程>, 《科幻文学研究专辑》, 第12期, 2022, pp.21-24.
- 刘洋, <女性具有更细腻的情感叙事吗? - 基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情感计算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2025年第6期, pp.89-100.
- 张进, 许栋梁, <幽暗生态学与后人文主义生态诗学>,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vol.38 No.4, pp. 96.

Abstract

Female Body Rhetoric in the Science Fiction of Zhao Haihong — A Case Study of the “Silence” Series

Guo Yi · Na, Min Gu

As a pioneering figure in Chinese women’s science fiction, Zhao Haihong has persistently explored the intersections of the female body, technology, and subjectivity. From early narratives grounded in conventional gender metaphors to later works that foreground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and gender politics, her fiction reveals distinctive modes of female body rhetoric. Taking Zhao Haihong’s representative works as its primary corpus, this study draws on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theory, body rhetoric theory, and body–technology relations to examine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e female body.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of bodily representation: the symbolized body, the technologized body, and the politicized body. Through these dimensions, the female body in Zhao’s fiction shifts from a disciplined object to a technological and narrative subject. By artic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body through science-fictional discourse, Zhao Haiho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omen’s science fic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significance of female body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Key words : Zhao Haihong; Chinese women's science fiction; female body; body rhetoric; cyborg; feminist SF

투 고 일 : 2026. 4. 10. / 심 사 일 : 2026. 4. 15.~ 2026.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5. 20.